

生活与命运

下

[苏] 瓦·格罗斯曼 著



与 生活 命运 生命

下

苏·瓦·格罗斯曼著

冯增义 译
曹国维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第三部

1

开始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前几天，克雷莫夫来到六十四集团军的一个地下指挥所。军委委员阿勃拉莫夫的副官坐在写字台后面，就着鸡汤吃馅饼。

副官放下汤匙，从他叹气来看，鸡汤味道很好。克雷莫夫的眼眶湿润了，突然涌起吃白菜馅饼的强烈欲望。

副官报告以后，隔板后面悄无声息，接着听到了克雷莫夫已经熟悉的嘶哑的嗓音，但这一次说话声音不大，克雷莫夫听不清在讲什么。

副官走出来，说：

“军委委员现在不能接见您。”

克雷莫夫感到惊讶：

“我没有请求接见。是阿勃拉莫夫同志召见我。”

副官一声不吭，眼睛盯着鸡汤。

“这么说，取消了？我简直不明白，”克雷莫夫说。

克雷莫夫回到地面，沿着小山沟向伏尔加河岸慢慢走去，军报编辑部就设在那里。

他走着，因为莫名其妙的召见，因为突然攫住他心的、对别人的馅饼的强烈欲望，窝了一肚子火，侧耳倾听从库波罗斯山谷方向传来的断断续续和懒洋洋的炮击声。

一位头戴船形帽、身穿军大衣的姑娘向作战处方向走去。克雷莫夫打量了她一眼，暗想：“真漂亮。”

一种惯常的忧伤向他袭来，心猛地揪紧了，他想到了叶妮娅。旋即，也和惯常那样，他呵斥自己说：“抛开她，抛开！”他回想起在小镇上借住的那一夜和那个年轻的哥萨克女人。

后来，他想到了斯皮里多诺夫：“一个好人，当然，不是斯宾诺莎^①。”

所有这些念头，懒洋洋的炮击，对阿勃拉莫夫的恼怒，秋日的天空，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回忆起来都异常地清晰。

他被一个军大衣上标有大尉衔绿杠杠的司令部工作人员叫住了。从他离开指挥所起，大尉一直尾随着他。

克雷莫夫困惑不解，看了看他。

“上这儿来，上这儿来，请，”大尉声音不高地说，一边用手指着一幢木屋的门。

克雷莫夫走进木屋，门口站着哨兵。

他们走进一个房间，里面放着一张办公桌，板壁上挂着一幅用图钉钉住的斯大林的肖像。

克雷莫夫以为，大尉大概会这样对他说：“请原谅，营政委同志，您不会拒绝把我们的报告转交给左岸的托谢耶夫同志吧？”

但大尉没有这样说。

他说：“交出武器和个人证件。”

克雷莫夫茫然地说了一句已经毫无意义的话。

“您有什么权利？收缴我的证件以前，您先出示自己的证件。”

然后，他确信发生了荒唐和不可思议的事情，而这已经是无

^① 斯宾诺莎(1632—1677)，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。

可怀疑的了，于是说了类似情况下成千上万的人在他以前也嘟嘟囔囔说过的话：

“这是胡闹。我简直什么也不明白，是误会。”

但这已经不是一个自由的人说的话了。

2

“您在装蒜。说，被围期间您被谁收买了？”

在伏尔加河左岸的方面军特勤处里，他已经受过审讯了。

油漆的地板，窗台上的花盆，墙上的挂钟散发出外省的宁静气息。玻璃的颤动和从斯大林格勒那边传来的隆隆声——显然，轰炸机在右岸轰炸——使他感到习以为常和亲切。

坐在农家桌子后面的部队中校，和想象中嘴唇苍白的侦查员怎么也对不起号。

但现在这个肩膀在熬过的炉坑上抹到白粉的中校，走近坐在农家凳子上的东方殖民地国家工人运动的行家、穿着军装、袖口上佩有红星的政委，慈爱的母亲生养的儿子，朝他脸上猛地揍了一拳。

尼古拉·格里戈里耶维奇用手抹了抹嘴唇和鼻子，朝自己的掌心一看，见到上面有掺和着唾液的血。随后他动了几下嘴巴。舌头已经僵硬，嘴唇也麻木了。他看看上过油漆、不久前洗刷过的地板，把血咽了下去。

深夜，对特工人员的憎恨涌上心头。但在最初的瞬间，既无憎恨，也不感到疼痛。打在脸上的一拳意味着中校精神的崩溃，它除了麻木、发楞以外，不能引起其他任何感觉。

克雷莫夫回头一看，见到哨兵，不由害臊起来。一个红军战士看到了共产党员挨打！挨打的是共产党员克雷莫夫！挨打的

时候小伙子在场，正是为了他才进行了那场克雷莫夫参加的伟大的革命。

中校看了看表。正是处长食堂供应晚餐的时候。

克雷莫夫踩着灰色的雪糝，穿过院子，被押到圆木牢房去的时候，从斯大林格勒传来的飞机轰炸声特别清晰。

从麻木中苏醒后的第一个念头使他震惊：能把这座牢房炸毁的只有德国人的炸弹……这个念头很平常，但是令人厌恶。

在令人窒息的圆木墙壁的牢房里，绝望和狂怒攫住了他的心——他已经不能自制了。这是他，是他扯着嘶哑的嗓门喊叫着，奔向飞机，迎接了自己的朋友格奥尔吉·季米特洛夫^①；是他抬过克拉拉·蔡特金^②的灵柩；而他现在居然得偷偷窥视特工人员会不会再给他一拳。他带领大家冲出重围，他们叫他“政委同志”。而现在这个挎上冲锋枪的集体农庄庄员居然向他，向在审讯中被另一个共产党员毒打的共产党员投来厌恶的目光……

他还无法意识到这四个字的巨大涵义：“剥夺自由。”他成了另一种生物，他身上的一切都应改变，因为他被剥夺了自由。

他气得眼睛发黑……他要去找谢尔巴科夫，找党中央，他可以直接向莫洛托夫告状，只要这个混蛋中校不枪毙，他决不罢休。你把话筒拿起来吧！打电话给克拉辛。何况连斯大林本人都听说过我的名字，知道我的名字。斯大林有一次曾问过日丹诺夫同志：“这是哪个克雷莫夫，是在共产国际工作过的那个？”

可是尼古拉·格里戈里耶维奇立刻感到脚下是一片泥沼，他

① 格奥尔吉·季米特洛夫(1882—1949)，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。

② 克拉拉·蔡特金(1857—1933)，德国共产党的奠基人，作家，批评家。

马上就会陷入黑漆漆、黏糊糊、油光光的无底深渊……比德国装甲师更为强大的难以抗拒的力量压住了他。他被剥夺了自由。

叶妮娅！叶妮娅！你看到我了吗？叶妮娅，看看我吧，我遭到了极大的不幸！我孤零零一个人，被大家抛弃了，也被你抛弃了。

一个败类打了他。脑袋昏昏沉沉，他气得手指发抖，真想朝特工人员猛扑过去。

他对宪兵，对孟什维克，对被他们审讯的党卫军军官都不曾有过类似的憎恨。

在践踏他的人身上，克雷莫夫看到的不是一个陌生人，而是他自己，克雷莫夫，那个被《共产党宣言》中“全世界无产者，联合起来！”的口号所感动，因而幸福得流泪的孩子。这种相似的感觉实在可怕。

3

天黑了。有时斯大林格勒会战的隆隆炮声填满了空气混浊的狭小牢房。也许，德国人在轰击保卫正义事业的巴秋克和罗季姆采夫的部队。

过道上偶尔有人走动。关押着逃兵、祖国的叛徒、抢劫犯和强奸犯的集体牢房的门，开了又关，关了又开。他们常常要求上厕所，哨兵在开门之前，总要和他们争吵很久。

克雷莫夫从斯大林格勒右岸解来以后，关押在集体牢房里的时间并不长。谁都没有注意这位袖口上还有红星的政委，他们感兴趣的只是他有没有卷马合烟的纸。这些人除了吃饭、抽烟、大小便，什么都不想。

是谁，是谁发难？多么痛苦：明明知道自己无辜，却为洗刷

不清的罪名感到寒心。罗季姆采夫部队的军号，“6-1”大楼的断垣残壁，白俄罗斯的沼泽，沃罗涅日的冬天，江河的渡口——这幸福和轻松的一切都已经失去了。

他想走出去，散散步，抬头看看天空。去拿张报纸。刮一刮胡子。给弟弟写封信。他想喝茶。他需要还掉昨晚到期的书。看看表。上澡堂洗个澡。从皮箱里拿一块手帕。可是他什么也干不了。他被剥夺了自由。

过了一会儿，克雷莫夫被押出集体牢房，到了过道上，这时监狱长骂起哨兵来了：

“我不是明明对你说过，见鬼，你怎么把他塞到集体牢房里去了？干吗呆着，想上前线，是吗？”

监狱长走后，哨兵对克雷莫夫抱怨说：

“瞧，总是这样。单人牢房里有人了！是他自己下的命令，说单人牢房专关枪毙的！要是把您投进去，我把他关哪儿去？”

尼古拉·格里戈里耶维奇很快看到，冲锋枪手从单人牢房里押出了那个被判枪决的犯人。他的浅色头发紧贴着又窄又扁的后脑勺。也许他二十岁，也许有三十五岁。

克雷莫夫被带进腾空的单人牢房。他在昏暗中依稀辨认出桌上有一只饭盒，在它旁边他摸到了一只用面包瓢做的兔子。看来，犯人刚刚把它做好，面包还是软的，只是兔子的耳朵有点硬了。

这里比较安静……克雷莫夫半张着嘴，坐在铺板上，无法入睡；需要考虑的事情太多。但打昏的头脑无法思考，太阳穴发胀。脑袋里迷迷糊糊，一切都在旋转、摇摆、晃荡，什么也抓不住，理不出一个头绪来。

深夜，过道上重又传来了嘈杂的声音。哨兵们叫着派岗员的名字。响起了皮靴的走动声。克雷莫夫凭嗓音听出是监狱长

在说话。

“把这个见鬼的营政委带出来，让他呆到警卫室去。”接着又补了一句：“这是非常事件，就按非常事件处理，司令员一定会知道的。”

门打开了，冲锋枪手叫了一声：

“出来！”

克雷莫夫走了出来。过道里站着一个人，赤脚，身上穿着内衣。

克雷莫夫看到过生活中的许多不幸。但他一眼就发现，他还从未见过比这张脸更为可怕的东西。这脸瘦小、肮脏、蜡黄，整个儿——皱纹也好，颤抖的面颊也好，嘴唇也好——都在可怜巴巴地哭泣。只是眼眶里没有泪水，然而眼神极其可怕，这样的眼睛还是看不见为好。

“快走，快走，”冲锋枪手催促着克雷莫夫。

在警卫室里，哨兵向他述说了刚才发生的非常事件。

“他们用前线吓唬我，可这儿比前线更糟，这儿更容易得疯病……拉出去枪毙的是个自伤犯，他隔着面包朝左手开了一枪。把他枪毙了，撒上了土，可半夜里他活过来了，又回到了我们这儿。”

他和克雷莫夫说话，竭力避免称呼，不说“您”，也不说“你”。

“他们太马虎，真叫人受不了。牺牲口也得好好宰。干什么都马马虎虎。土冻硬了，光扒开一些杂草，胡乱撒上土就走。嘿，这不明摆着，他爬出来了！要是按规定埋了他，他永远也爬不出来。”

历来回答人们提的问题，对人们进行启发、解释的克雷莫夫，这会儿心慌意乱，他问冲锋枪手：

“他重新回来那有什么？”

哨兵冷冷一笑。

“把他押到草原上去枪毙的准尉还说，他重新登记以前，应该发给他面包和茶，可我们的司务长挺凶，出了个难题——既然他已经枪毙了，怎么给他喝茶呢？我看，这话对。他准尉闯的祸，倒让后勤部门替他承担责任？”

克雷莫夫突然问：

“和平时你干什么？”

“战前我在国营农场养蜂。”

“明白，”克雷莫夫说，因为周围和他身上的一切都变得难以理解，变得疯狂了。

天亮时，又把克雷莫夫押回到单人牢房。在饭盒旁边仍像原先一样放着面包瓢做的兔子。但现在兔子已经变硬，表面毛糙了。从集体牢房传来一个谄媚的声音：

“哨兵，行行好，押我去解个手，怎么样？”

这时，草原上升起了红褐色的太阳，活像一只冻坏的、肮脏的、沾满泥土的甜菜爬上了天空。

不久克雷莫夫被押上了一辆吨半卡车，他身边坐着负责押送的可爱的中尉，准尉把克雷莫夫的手提箱交给他，随后，吨半卡车便吱嘎吱嘎响着，在阿赫图巴河沿岸冰冻的泥路上颠簸着，向列宁斯克机场驶去。

他吸着阴冷潮湿的空气，内心充满信心和光明——一场恶梦似乎已经结束。

4

尼古拉·格里戈里耶维奇下了轿车，环视了一下卢比扬卡内部监狱灰色的高楼。因为飞机马达长时间的轰鸣，因为收割

和没有收割的田野、小溪、森林一闪而过，因为绝望、信心和犹豫的迅速交替，他脑袋里嗡嗡直响。

门打开了，他走进了官气十足、令人窒息而又灯光炫目的X光王国，走进了战争之外、避开战争、凌驾于战争之上的生活。

在一间憋闷的空房间里，在探照灯一般明晃晃的灯光下，他被命令脱光衣服。当一个神情专注、身穿白大褂的人检查他身体时，克雷莫夫频频打颤，暗想，战争的轰鸣和倾泻的钢铁居然无法阻止这些不知羞耻的手指的叩击。

牺牲的红军战士，防毒面具里夹着他在冲锋前写好的字条：“阵亡，为了幸福的苏维埃生活。家有妻子、六个孩子”；烧得乌黑的坦克手，一绺绺头发粘在年轻的脑袋上，几百万人民军队穿越沼泽和森林，用大炮轰击，用机枪扫射……

而这些手指我行我素，自信而又从容不迫。炮火下政委克雷莫夫高喊：“怎么，格涅拉洛夫同志，您不愿保卫苏维埃祖国！”

“转个身，弯腰，两脚分开。”

接着，穿上衣服的他敞着军服领子，从正面和侧面照了相，一张绷着脸，另一张面带笑容。

然后他在一张纸上不顾体面地使劲按了自己的手印。随后一个忙忙碌碌的工作人员剪掉了他裤子上的扣子，没收了皮带。

后来他乘着灯火通明的电梯上楼，沿着狭长的地毯穿过空荡荡的走廊，两边房门上都有圆形监视孔。外科医院病房，肿瘤外科。空气是暖洋洋的，官方的，被强烈的灯光照耀着。一座社会诊断学的X光研究所……

在这种憋闷和盲目的气氛中很难思考。恶梦、现实、呓语、过去、未来乱糟糟地纠缠在一起。他感觉不到自我的存在……我有母亲吗？也许，没有母亲。叶妮娅变得无关紧要。松树枝叶间的星星，顿河的渡口，绿色的德国信号弹。“全世界无产者，联

合起来”，每扇门后面都有人被关着，我死也是共产党员，现在米哈伊尔·西多罗维奇·莫斯托夫斯科伊在哪儿，脑袋嗡嗡直响，莫非格列科夫朝我开枪了，长着一头鬃发的格里戈里·叶夫谢耶维奇，共产国际主席，在这条走廊上走过，多么难受，多么压抑的气氛，多么讨厌的探照灯似的灯光……格列科夫朝我开枪，特工人员揍我的脸，德国人向我射击，明天我将怎样，我起誓，我没有罪，最好小便一下，在西多罗夫家里过十月革命节，那些可爱的老头唱歌了，全俄肃反委员会，全俄肃反委员会，全俄肃反委员会，捷尔任斯基做过这幢楼的主人，亨里希·亚戈达，还有缅任斯基也做过，后来是小个儿，长着一双绿眼睛的彼得堡无产者尼古拉·伊凡诺维奇^①，今天是亲切和聪明的拉夫连季·帕夫洛维奇，当然，当然，我们见过面，我们又来见您了，我们是怎么唱的：“起来，饥寒交迫的人们，要为正义而斗争”，我是无罪的，最好小便一下，难道要枪毙我……

多么奇怪，他走在像用箭射出来似的笔直的走廊上。而生活是那样杂乱，小路、峡谷、沼泽、溪流，草原上的尘土，没有收割的庄稼，你艰难地走着、绕着，无奈命运是笔直的，你走在—根纤细的钢丝上，走廊，走廊，走廊两边尽是门。

克雷莫夫从容不迫地走着，不紧不慢，似乎哨兵不是走在他背后，而是走在他前面。

一踏进卢比扬卡内部监狱他就有了新的感觉。

“点的规迹，”他在按手印时心里想，但他不明白，为什么这样想，虽然正是这个想法表达了他那新的感觉。

这种新的感觉之所以产生，是因为他失去了自我。如果他要求喝水，他可以有水喝，如果他心脏病发作，医生会给他注射必

^① 即叶若夫。

要的针剂。但他已经不是克雷莫夫了。他感到了这一点，虽然并不理解。他已经不是那个在穿衣、用餐、买电影票、思考、睡觉时总感到自己是独立存在的克雷莫夫同志了。克雷莫夫的心灵，智慧，革命前的党龄，发表在《共产国际》杂志上的文章，各种习惯和小的爱好，癖性，和莫斯科共青团区委书记、和工人、老党员、朋友、申请者谈话的声调，使他与众不同。现在，尽管他的身体仍像人的身体，他的动作、思想仍像人的动作和思想，但作为一个人，克雷莫夫同志的本质，他的尊严、自由已经消失了。

他被送进牢房，那是一个长方形的小间，有刷干净的镶木地板，放着四张单人床，被子铺得平平整整，没有褶子。刹那间，他感到那三个人正怀着人的好奇看着第四个人。

他们是人，至于好坏，他不知道，他们对他是敌视，还是冷淡，他也不清楚，但好也罢，坏也罢，冷淡也罢，凡是出自他们并传给他的信息都是人的信息。

他在指定给他的床上坐了下来，那三个人坐在自己床上，膝盖上放着打开的书，默默地瞅着他。于是，他那似乎已经消失的奇妙、宝贵的感觉又回到了他身上。

其中一个身材魁梧，大脑门，脸上凹凸不平，银色斑驳，像贝多芬那样蓬乱的髻发压在低低的、肥硕的前额上。

第二个是老人，有一双像纸一样白的手，瘦骨嶙峋的秃顶和面孔，像是铸在金属上的浮雕，似乎他血管中流的是雪，而不是血。

坐在克雷莫夫邻床上的第三个人模样很可爱，不久前摘掉的眼镜在鼻梁上留下一块红色的印记，此人不幸而又善良。他指了指门，难以觉察地笑了笑，摇摇头，于是克雷莫夫明白了——哨兵在监视孔里窥视，应当沉默。

第一个开口说话的是头发蓬乱的人。

“好吧，”他慵倦而又和善地说，“我以公众的名义向武装部队致敬。您从哪儿来，亲爱的同志？”

克雷莫夫讪讪一笑，说：

“从斯大林格勒来。”

“嗨，见到英勇保卫战的参加者非常高兴，欢迎您光临寒舍。”

“您抽烟吗？”脸色苍白的老人迅速地问。

“抽，”克雷莫夫回答。

老人点点头，重又全神贯注地看书。

于是，邻床那个可爱的近视眼说：

“是这么回事，我让同志们为难了，我说我不抽烟，结果分烟就没我的份。”

他问：

“您离开斯大林格勒很久了？”

“今天早上还在那儿。”

“噢，”大个子说，“乘‘道格拉斯’来的？”

“对，”克雷莫夫回答。

“您说说，斯大林格勒情况怎么样？我们没来得及订报纸。”

“想吃东西，是吗？”可爱的近视眼问，“我们已经吃过晚饭了。”

“我不想吃，”克雷莫夫说，“至于斯大林格勒，德国人是攻不下来的。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了。”

“我对此一直深信不疑，”大个子说。

老人啪的一声把书合上，问克雷莫夫：

“看来，您是共产党员？”

“是的，共产党员。”

“轻点，轻点，只能低声说话，”可爱的近视眼说。

“连问他是不是党员也不行。”大个子说。

克雷莫夫觉得此人面熟。他想起来：这是莫斯科著名的报幕员。有一次克雷莫夫和叶妮娅一起到圆柱大厅去听音乐会，在台上见过他。现在他们在这里见面了。

这时门打开了，哨兵探头看了看，问：

“谁是‘K’打头的？”

大个子回答：

“我就是，卡策内连博根。”

他站起来，用手理了理蓬乱的头发，不慌不忙地朝门口走去。

“提审，”可爱的邻居低声说。

“为什么叫‘K’打头的？”

“这是规矩。前几天哨兵传他的时候说：‘这儿谁是“K”打头的卡策内连博根？’实在可笑。真是个怪人。”

“是这样，大家都笑开了，”老人说。

“可你为什么上这儿来了，老会计？”克雷莫夫想，“我也是‘K’打头的。”

囚犯们开始收拾床铺睡觉，强烈的灯光没有熄灭，因此克雷莫夫觉得有人通过监视孔在观察他怎样解开包脚布，提上衬裤，在胸口挠痒痒。这种灯光用于特殊的目的，不是为牢房里的人照明，而是为了更好地监视他们。假如在黑暗中监视他们更方便的话，那一定会把他们监禁在黑暗中。

老会计面壁而卧。克雷莫夫和邻床的近视眼悄悄说话，他们相互不看着对方，用手掩着嘴巴，以免哨兵看到他们嘴唇的翕动。

他们不时看看那张空床——现在报幕员在受审中大概妙语连珠。